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汪雨龙, 谢 敏, 刘 亮*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宁波 315100)

摘 要: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已然成为现阶段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和创新的基本共识, 初步形成了“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整体格局。本文综述了当前公众参与社会共治的诸多障碍, 既有风险评估过程的“排他性”、风险交流流于形式、信息公开不全和滞后等政府制度规制问题, 还有公众参与意愿不强和参与能力不足等自身问题。提出了应当从健全公众参与风险治理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司法救济、优化公众参与激励机制和加强食品安全教育等多措并举, 提高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和积极性, 旨在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有效实现, 为深化社会共治格局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 风险治理; 困境与对策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WANG Yu-Long, XIE Min, LIU Liang*

(Zhejiang Pharmaceutical College,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Social co-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basic consensus of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at the present stage, which contains enterprise self-discipline, government oversight, social cooper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legal safeguard.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for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the multi-governance, includ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system such as the exclusiveness of risk assessment, risk communication in form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as well as public defects for instance weak public willingness and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capacity. To overcome the above dilemma, we should improv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strengthen judicial remedy relief, optimize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tensify food safety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capacity and enthusia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isk governance for ensuring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The aim i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the pattern of social co-governance.

KEY 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9YJC790155)、2019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Y201942826)

Fund: Supported by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Youth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YJC790155), and the General Project of Zhejiang Educational Committee in 2019 (Y201942826)

*通讯作者: 刘亮,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质量与安全。E-mail: liangliu82@sina.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Liang, Professor, Zhejiang Pharmaceutical College, No.666, Siming Road, Fenghua District, Ningbo 315500, China. E-mail: liangliu82@sina.com

1 引言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难题^[1,2],实现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规制、维护公众健康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十九大以来,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新举措,重点突出了风险治理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但实践中基于风险分析的监管机制过于宏观,没有细致规定;风险评估制度具有较强的行政依附性,表现为“纯专家”行为;风险交流停留在单向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教育方面。公众作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和重要的监管力量,参与渠道单一、制度不完善、维权成本高、知晓信息有限等诸多障碍和缺陷,导致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阶段亟待破除公众参与风险治理困境,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本文拟分析当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现状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现实困境,为进一步健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提供参考。

2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述评

食品安全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基于这一客观事实,保障食品安全就没有旁观者。《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原则,初步形成了“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整体格局。

从文献报道来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主要表现为 3 个方面,一是社会共治视角的多元化,包括理论视角(比如公共治理理论^[3,4]、协同治理理论^[5]、博弈理论^[6-8]、社会资本理论^[9]等)、学科视角(比如刑法学^[10])和主体视角(比如媒体^[11]、行业协会^[12]、个体公众^[13]和多主体^[14]等);二是社会共治的制度和机制研究,如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法制构想^[15,16]、论社会共治的机制与体制建设^[17]、美国食品安全第三方认证制度^[18];三是社会共治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如政府支持型自组织的构建^[19]、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化手段的应用^[20]、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21]。

多元主体的社会共治,不是简单的力量叠加,加上治理对象本身、治理主体间关系和共治过程等复杂性,导致当前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合力效果也未完全发挥体现出来,还需要认识到共治体系的构建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3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困境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公众参与”指的是个体公众(如消费者、律师、食品企业职工等)和由个体公众组成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如媒体、消费者协会、第三方平台、绿色和平组织等),按照一定的程序参与到食品安全标准与法规制

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交流等过程中,与监管部门共治食品安全问题^[22]。现实中由于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本身的复杂性、食品安全标准与法规的专业性,而普通公众又通常被认为缺乏有效知识,且容易受到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干扰产生“非理性”,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基本上被专家和技术官僚所垄断,普通公众则被排除在风险治理决策过程之外^[23]。究其原因有 2 大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和参与路径,二是公众自身能力和参与意愿不足。

3.1 环境制度困境

3.1.1 公众参与权架空的尴尬

公众参与权是公众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发挥其功能的基础保障。现行一些法律法规对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相关权利做出了相应的规定^[24],比如《食品安全法》第 9 条、第 10 条、第 12 条、第 23 条和第 28 条等规定了公众可依法进行社会监督、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提出建议、就风险评估信息和监督管理信息进行交流沟通、对食品安全标准草案征求意见和参与审查等内容,体现了公众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监督权、建议权、投诉和举报权、表达和决策参与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也对食品监督检查等政府部门应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确保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信息的知情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6 条、第 8 条、第 15 条、第 37 条等为个人和相关组织维护合法权益、对违法行为检举和控告、相关立法参与的知情权、监督权、诉讼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上述法律法规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和风险治理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整体上都比较笼统和抽象,公众参与路径和参与程度缺乏操作性。比如,公众参与风险交流的途径仅限于听证会、新闻发布会等被动接受形式;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监督抽检结果、食品安全事件等信息未被充分披露,或者因发布不及时造成信息获取障碍时有发生;举证难、举报人信息泄露、举报奖励审批慢等现状致使公众投诉举报热情难以调动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已经流于形式,呈现出了权利被架空的尴尬局面。

3.1.2 风险评估与风险交流制度不完善

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具体实施则由下属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表现为“纯专家”行为,评估过程缺乏民众意见,公众只能被动接收政府机构单向发布的标准与法规这一结果;而专家的产生又严重依附于卫生行政部门(又称为“受聘专家”),缺乏自主启动权、相对独立性和同行专家监督,以致公众对专家本身的客观和中立产生质疑和不信任^[25]。

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风险决策提供良好的基础,是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有效方式。虽然学术界对于风险交流的概念观点不一,但至少都包含了风险交流的主体、风险交流的内容和风险交流机制3方面^[26]。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方面的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风险交流的范围、机制以及主体责任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公众参与风险交流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单向性,比如各种新闻发布会,而对标准和法规等修订征求意见过程中收集的意见采纳情况和回复则较少披露,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逐渐降低。

3.1.3 信息公开机制有待健全

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当前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成因之一^[27]。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创租”“寻租”制造了空间,还会引发企业的“道德败坏”,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等市场失灵现状。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还是信息披露不够,包括政府、企业和其他相关主体(如第三方认证机构)的披露。

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公开披露的食品安全信息一是内容有限,如监督抽检、行政处罚、企业信用等都属于事后监管,缺乏科学分类,不能满足不同公众主体的需求;二是公开的渠道分散,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网站,缺乏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食品业态,比如“网红食品”、网络餐饮(外卖)等,食品安全追溯难度大,网络食品信息公开存在较大改善空间,比如公开经营许可证、顾客评价信息、食品安全事故、信用状况等,接受社会监督。

企业作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则较少主动披露信息,即使披露也十分有限,公众主要通过食品追溯码和食品标签(说明书)来了解信息,而追溯体系本身存在覆盖面窄、信息不全等不足^[28]。以生鲜肉为例,市场上绝大部分企业追溯体系只能追溯到养殖牧场,至于养殖过程中的用药情况则无法知晓,而分割肉等精细加工肉则只能追溯到批次,不能具体到牧场和生猪。标签标识的不规范更是成为“打假斗士”的主要战地,让企业和监管部门疲于应对。对于食品加工过程控制、原料采购渠道、供应商等关键信息往往难以知晓。

3.1.4 公众维权保障制度不完善

尽管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众多法律规范中都支持公众运用司法诉讼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在实践中,公众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维权通常存在诸多问题。其一,食品投诉举报案件处理效率低下,相关法律对于监管部门处理程序、处理期限、监管不力追责等都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公众积极性大大降低,甚至对政府公信力产生影响^[29]。其二,缺乏先行赔付机制,公众通常因为争议解决程序复杂、耗时较长、经济实力不对等、诉讼成本高等原因,放弃索赔

或自认倒霉。其三,公益诉讼制度还不完善,比如消费公益诉讼仅限于“禁止性公益诉讼”,不涉及赔偿;诉讼主体资格狭隘,不包括受害人之外的个人;举证责任分担不公,“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下举证难的问题难以破解。

3.2 公众自身困境

3.2.1 参与意愿不强

食品安全事关民生,公众是食品安全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目前,我国公众对食品安全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较低的参与度,形成了较鲜明的反差。参与程度不高,原因也很多。一方面,现有公众参与风险治理渠道单一,监管部门又不注重信息反馈,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比如政府组织听证会听取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但是听证会程序选择、代表选取、意见采纳情况不能充分反映公众的意愿^[30]。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信息严重不对称,遇到问题维权时经济和时间成本高,难以以一己之力对抗食品生产经营者,即使维权成功,收益又相对较低等导致公众往往会有“得不偿失”“自认倒霉”的想法,从而失去维权的动力。再者,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作为一项科学理性的制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普通公众因缺乏食品安全相关知识,食品安全教育和培训不足等现状只能“望而却步”。

3.2.2 参与能力不足

公众参与能力是公众能否有效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内因”,也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社会共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31]。目前我国学者对公众参与方面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问题——对策”层面,针对参与能力方面的研究则鲜见。胡婧超^[32]抽取山西省60个县区3068人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能力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仅有30.5%的人了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43.7%的人认知能力较低、65.1%的人不了解食品安全法。孔娜娜^[33]随机调查92位公众个体的食品安全治理参与能力,从评价结果来看,我国公众个体食品安全治理参与能力普遍不高,大部分公众个体参与能力位于“一般”以下等级。

4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对策建议

4.1 健全风险治理机制

其一,强化风险评估的独立性。参照欧美发达国家先进做法,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职能进行切割,保证两者之间的独立性或者交由不同的机构来承担^[34]。鉴于风险评估过程专家独立性受到限制,可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或者转变相关职责,由承担风险评估转变为监督、审核风险评估。其二,建立面向公众的风险评估大数据平台。接入企业产品认证、第三方检测、消费者投诉、线上用户评价等信息,作为监督等级评价和风险评估的基础参考指标。其三,风险评估分层分类参与。危害识别过程对专业知识要求相对较低,普通公众、食品生产经营者、社会团体组

织等可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网络在线答疑等方式全方位参与。而危害分析、风险特征表述等专业性较强的风险评估过程可构建同行评审机制,同行专家可在专家委员会评估完成后匿名提出异议以及结果投票。其四,创建有效的风险交流机制。首先,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公众参与风险交流的内容、参与方式、参与度等具体要求,保护公众参与风险交流的权利。其次,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公众互动,搭建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满足不同层面、不同类型受众对风险信息的需求,提升风险交流效果^[35]。最后,出台风险交流指南,为风险交流实践提供技术指导,定期调整与更新,更加科学、有效的开展交流,提升风险治理水平。

4.2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开放的程度和方式直接影响着公众参与的兴趣和效果,重点加强政府、企业自身和第三方机构信息披露。首先,风险评估部门应在评估结束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准确公布评估信息,保留评估过程全部资料,对于公众的质疑,应及时澄清和解释。其次,支持和引导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增加源头种养殖、食品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信息透明度,比如原料种养殖环节农兽药使用投入信息、生产工艺、过程控制、仓储运输和销售环境等信息,提高公众对食品生产和经营企业的认知度。再次,第三方检测与认证机构应公开承担的合格评定、体系认证和产品评级等过程报告,可在其官方网站在线发布,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确保其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后,完善信息披露立法,明确各方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序和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进行科学分类,满足不同使用者的多种需求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科学准确,专业术语配合图片、视频等方式进行科普介绍。

4.3 强化公众参与救济机制

现阶段我国公众参与风险治理机制不完善、参与能力不平衡等现状限制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亟需司法救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目前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结合我国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经验,可以在诉讼主体、举证责任和诉讼费用等方面进行完善,比如诉讼主体方面允许公众个人的起诉权,尤其要鼓励具有相应背景的律师提起公益诉讼;举证责任方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食品生产经营者举证,减轻公众个人举证难和败诉的风险;诉讼费用方面,可以不预交诉讼费用,待结案后由败诉方承担或者申请食品安全公益基金援助,还可以引入误判责任豁免制度,对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的误判导致败诉的可豁免相应责任^[36]。

4.4 破除公众自身困境

为了提高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意愿和能力,

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一要优化公众参与激励机制,比如健全公众维权举报成本补偿机制,简化维权和奖励审批程序,加大举报奖励额度,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拓宽投诉举报渠道(微博、公众号、短信、邮箱、贴吧、论坛等),引入参与创新机制(如积分制^[37])。二要重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对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过程中收集的意见是否采纳均要予以说明和回复,写入评估报告、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应当给予当事人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保护公众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可形成良性互动,达到一种示范效应。三要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教育制度,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食品安全“五进”(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活动纳入地方政府日常工作和考评,通过网络、新闻、讲座等形式,加强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客观上增强公众维权意识和表达自我意愿的能力。

5 总 结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整体格局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实践时间不长,还存在诸多困境,诸如公众参与权架空、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参与程度和方式有限、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滞后或不全、公众维权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公众自身参与风险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现存问题,有必要加强风险治理制度科学设计,扩大公众参与的途径和方式;完善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加强公众自身维权意识和参与能力,巩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社会共治”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Ghaida TA, Spinnler HE, Soyeux Y, *et al.* Risk-based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govern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law, EU, USA, Canada and France: Effective system for Lebanon as for the WTO accession [J]. Food Control, 2014, 44: 267–282.
- [2] Yi K.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 China: Change and continuity [J]. Food Control, 2019, 106: 106752.
- [3] 潘慧明. 公共治理理论视域下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6, (13): 147–148.
Pan HM. Research o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J]. J Comm Econ, 2016, (13): 147–148.
- [4] Wu L, Liu P, Lv Y, *et al.* Social co-governance for food safety risks [J]. Sustainability, 2018, 10(11): 4246.
- [5] 翟雪华, 杜兴兰. 协同治理视角下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研究[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 10(14): 4796–4801.
Zhai XH, Du XL. Research o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 J Food Saf Qual, 2019, 10(14): 4796–4801.
- [6] 吕永卫, 霍丽娜. 网络餐饮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演化博弈分析[J]. 系统科学学报, 2018, 26(1): 78–81.
Lv YW, Huo LN. Analysis of evolutionary game of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in internet catering industry [J]. J Syst Sci, 2018, 26(1):

- 78–81.
- [7] 王冀宁, 陈森, 陈庭强. 基于三方动态博弈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J]. 江苏农业科学, 2016, 44(5): 624–626.
- Wang JN, Chen M, Chen TQ.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based on tripartite dynamic game [J]. Jiangsu Agric Sci, 2016, 44(5): 624–626.
- [8] Lin Q.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ance based on cooperative game [J]. Agric Agric Sci Proc, 2010, (1): 423–428.
- [9] 沈秋欢, 申俊龙.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研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8, 20(3): 78–86.
- Shen QH, Shen JL. Research on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J]. J Tianjin Admin Instit, 2018, 20(3): 78–86.
- [10] 彭凤莲.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刑法学分析[J]. 法学杂志, 2018, (2): 98–107.
- Peng FL. A criminal law analysis on food safety social co-governance [J]. J Law, 2018, (2): 98–107.
- [11] 郑策, 夏慧, 黎桂宏, 等. 社会共治视角下新媒体与食品安全——作用与机制[J]. 食品工业, 2015, 36(1): 232–237.
- Zhen C, Xia H, Li GH, *et al.* New media and food safety under the public co-governance perspective role and mechanism [J]. Food Ind, 2015, 36(1): 232–237.
- [12] 陈梦婷, 黄超.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及制度建构[J]. 法制与社会, 2019, (2): 134–135.
- Chen MT, Huang C. The legal statu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the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J]. Law Soc, 2019, (2): 134–135.
- [13] 孔娜娜, 马娇. 基于 DEMATEL-ISM 的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能力指标研究[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 10(3): 255–261.
- Kong NN, Ma J. Studi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bility elements of food safety governance based on DEMATEL-ISM [J]. J Food Saf Qual, 2019, 10(3): 255–261.
- [14] 王阿妮, 徐彪, 顾海. 食品安全治理多主体共治的机制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 (3): 64–70.
- Wang AN, Xu B, Gu H. Social co-regulation of food safety under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J]. Nanjing Soc Sci, 2020, (3): 64–70.
- [15] 李如霞.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法律问题研究[D]. 长春: 吉林财经大学, 2018.
- Li RX. The research on the legal issues of the social common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D].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
- [16] 杜波. 关于食品安全风险共治的法律制度构想[J]. 河北法学, 2016, 34(10): 102–110.
- Du B. The concep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bout co-regulation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J]. Hebei Law Sci, 2016, 34(10): 102–110.
- [17] 钟广静. 论中国食品药品安全实现社会共治的机制与体制建设[J]. 兰州学刊, 2017, (4): 198–208.
- Zhong GG. Mechanis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in China [J]. Lanzhou Acad, 2017, (4): 198–208.
- [18] 陈永法, 覃红艺. 我国公众参与食品和药品安全治理的不足及对策[J]. 中国药房, 2016, 27(16): 2164–2167.
- Chen YF, Qin H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food and drug safety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J]. China Pharm, 2016, 27(16): 2164–2167.
- [19] 谢康, 刘意, 肖静华, 等. 政府支持型自组织构建——基于深圳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 (8): 64–80.
- Xie K, Liu Y, Xiao JH, *et al.* Government supported self-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social co-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in Shenzhen [J]. Manag World, 2017, (8): 64–80.
- [20] 陶光灿, 谭红, 宋宇峰, 等. 基于大数据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探索与实践[J]. 食品科学, 2018, 39(9): 272–279.
- Tao GC, Tan H, Song YF, *et 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based co-regulation model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J]. Food Sci, 2018, 39(9): 272–279.
- [21] 李洪峰.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J]. 食品与机械, 2016, 32(4): 234–236.
- Li HF. Analysis of realistic pli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social co-governance on food safety in china [J]. Food Mach, 2016, 32(4): 234–236.
- [22] 陈永法, 祁舒. 美国食品安全第三方认证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9, 10(12): 3641–3647.
- Chen YF, Qi S. American food safety third party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J]. J Food Saf Qual, 2019, 10(12): 3641–3647.
- [23] 张海柱.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科学与政治: 欧盟经验与启示[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 41(4): 85–91.
- Zhang HZ.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EU's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s [J]. J Dialect Nat, 2019, 41(4): 85–91.
- [24] 李洪峰. 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众参与权探析[J]. 法制与社会, 2016, (6): 188–190.
- Li HF. Analysis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right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J]. Legal Syst Soci, 2016, (6): 188–190.
- [25] 徐信贵, 朱钊, 梁潇. 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理性与公众参与的协调[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1(7): 112–117.
- Xu XG, Zhu Z, Liang X. Analysis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xpert rationali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J]. J Chongqing Univ Tech (Soc Sci Ed), 2017, 31(7): 112–117.
- [26] 李长健, 张天雅. 欧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经验及其启示[J]. 食品与机械, 2018, 34(2): 79–82.
- Li CJ, Zhang TY.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exchange system of food safety risk [J]. Food Mach, 2018, 34(2): 79–82.
- [27] 杜志浩, 时洪洋, 王军永. 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成因与对策——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J]. 食品工业, 2019, 40(3): 239–243.
- Du ZH, Shi HY, Wang JY. Dilemma, causes and counter measures on food safety governa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Food Ind, 2019, 40(3): 239–243.
- [28] 孙敏.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困境与出路[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2(2): 39–45.
- Sun M. The institution dilemma and outle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J]. Wuhan Univ Tech (Soc Sci Ed), 2019, 32(2): 39–45.
- [29] 胡旭. 食品安全社会公众监管机制的困境与出路[J].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9, 24(6): 63–66.
- Hu X.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public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food Safety [J]. J Hebei Rad TV Univ, 2019, 24(6): 63–66.
- [30] 刘娟.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法律问题研究[J]. 法制与经济, 2017,

- (10): 61–64.
- Liu X. Study on legal issu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J]. Legal Econ, 2017, (10): 61–64.
- [31] 马娇. 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能力评价研究[D]. 焦作: 河南理工大学, 2017.
- Ma J. The study one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apacity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D]. Jiaozuo: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7.
- [32] 胡婧超. 山西省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能力现状及提升策略研究[D]. 太原: 山西医科大学, 2019.
- Hu JC. A study 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measur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capacity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in Shanxi [D]. Taiyuan: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2019.
- [33] 孔娜娜. 食品安全治理公众个体参与能力评价模式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18, 40(2): 141–146.
- Kong NN. Research on the assessment model of public individuals participation ability to food safety governance [J]. J WUT (Infor Mana Eng Ed), 2018, 40(2): 141–146.
- [34] Wu YN, Liu P, Chen JS.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Food Control, 2018, 90: 212–221.
- [35] Nychas GE, Panagou EZ, Mohareb F. Novel approaches for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J]. Curr Opin Food Sci, 2016, 12: 13–20.
- [36] 李洪峰.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法律制度构建[J]. 中国卫生法制, 2018, 26(1): 20–24.
- Li H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J]. Chin Health Law, 2018, 26(1): 20–24.
- [37] 李全伦, 杨正凤. 引入积分制破解公众参与市场监管难[J]. 社会政策研究, 2019, (4):160–168.
- Li QL, Yang ZF. Introducing integral system to solve 3 major proble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arket supervision [J]. Soc Poli Res, 2019, (4): 160–168.

(责任编辑: 于梦娇)

作者简介



汪雨龙,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监管。

E-mail: yulogwang1987@126.com



刘 亮,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质量与安全。

E-mail: liangliu82@sina.com